

中国外交中的多元思想: 实践与源泉

简军波

(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中国多元外交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尊重主权平等和坚持非干涉原则、实施审慎的多边主义、主张多极化和国际民主, 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等。多元思想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基础, 其来源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传统文化(历史因素)、追求现代化的国家身份(行为体因素)、东亚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和冷战遗留(体系因素), 以及国家领导人对于中国作为特殊国家的认知(观念因素)。然而, 建立在多元思想基础上的中国外交实践将遇到美国霸权与欧盟规范化等西方的挑战。

关键词: 中国外交; 多元思想; 实践; 源泉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0)06-0066-05

作为文明古国, 中国历史延续了将近 5 千年, 其早期对外事务主要和周边蛮族及附近藩属国相关, 长期以来由中国行政机构中的礼部或相似机构所掌管。当时中国对外关系主要建立在特殊的国际等级体系——朝贡体系——的基础上, 在这一体系中, 中国处主导地位, 蛮族和藩属国政权处从属地位。然而, 甲午战争败于日本之后, 近代中国经历了长达百年的痛苦和屈辱外交,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才开始新的外交历程, 这一外交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最初建立在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为重要补充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¹

本文将关注新中国(尤其是冷战后)的外交理念基础。近年来, 有不少学者将冷战后中国外交所依赖的理念归结为多边主义、双边主义或其他一些意识形态标签(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例外主义等)。然而, 虽然上述意识形态是中国外交所遵循或采用的重要原则, 但, 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解释 1990 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趋势, 或精确描述与解释中国的外交功能与性质。从根本上看, 本文认为多元思想(pluralism)而非多边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为冷战后中国外交的主要哲学基础。

一、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多元思想

1. 国际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观念的产生和当前世界主要宗教如基督教、佛教或伊斯兰教的产生密切相关。在东方世界, 宗教的多样性一直存在, 尽管有时也相互排斥。公元前 3 世纪, 印度国王阿索卡(Ashoka)曾发布过世界上第一个宗教宽容令, 奠定了当地佛教和婆罗门教和平相处的基础。^{(1)(P48)} 在另一东方大国中国, 几乎在所有朝代都不存在重大的宗教迫害, 宗教多元主义基本上得到了贯彻。

在西方, 虽然宗教的多样性在古希腊或罗马一直存在, 但随着基督教的兴起, 宽容和宗教多元主义变得不可接受。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晚期合法化之后, 随着后来梵蒂冈权威的巩固, 宗教多元主义在欧洲已经绝无可能。即使由路德和加尔文在 16 世纪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也不是为了传播宽容观念和宗教多元主义, 而是为了扩展新教徒的势力与世俗权威。^{(1)(P39)} 然而,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最终还是为宗教多元主义铺平了道路。从此, 宗教多元主义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价值在宗教和世俗世界重获尊重。当宗教多元主义在现代社会得以巩固之后, 宗教多样

收稿日期: 2010-06-19

基金项目: 欧盟 FP7 之 MERCURY 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简军波(1976—), 男, 湖南益阳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¹ 参见 Hughes Christopher R. Nat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2005 pp 119-135.

² 例如, 胡格赫斯(Hughes)认为“地区多边主义给中国提供了有效的方式保护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一趋势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的袭击(911 事件)后得到了巩固”。见 Christopher R. Hughes Nat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2005, p 127; 同时参见王逸舟: 新中国多边外交, 《太平洋学报》, 2001 年第 4 期; 杨杰勉: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求是》, 2008 年第 18 期; 吴建民: 《中国三十年外交大发展》《当代中国》, 2008 年。

性获得允许甚至鼓励,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教义具备超越于别的宗教的优势,或具有解释真理或预测人类未来的优势。

20世纪早期,多元主义开始成为政治学术语。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 Laski)用多元主义理论挑战传统政治理论,认为国家并非行使主权的唯一行为体,其他社会行为体如工会、政党、教会等也和国家一样重要,具备控制和管理整个国家事务的能力。¹ 他的政治多元主义思想与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观点一致,托克维尔认为利益群体也有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能力。

若考察宗教的和政治的多元主义观念,可以看出“宽容”与“平等”为多元主义的核心观点,因此国际多元主义的含义应体现为不同意识形态和国际行为体的平等性。基于此,则试图向他国扩散或渗透本国社会伦理、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的做法是没有合法性的;与此同时,所有国家在主权上应一律平等,所有国际行为主体有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

2. 建立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中国外交实践

在后冷战时代,从宏观上看,中国外交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如下一些目标而开展的,包括尊重主权独立和互不干涉内政、审慎的多边主义、国际民主化和多极化,等等。虽然这些目标看似互不相同,然而都符合“平等”与“宽容”的价值观念,即都体现为多元思想的理念。

(1) 平等外交作为中国外交基本目标或原则的主权独立和互不干涉原则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即每个国家无论其人口、政治体系、领土或国力大小等一律平等。因此中国主张,虽然不同国家在许多特性上互为不同,但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

中国也主张国际民主和多极体系应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尤其是值得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² 国际民主不仅意味着主权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平等地位,也意味着所有国家之间基于开放、真实和诚实而开展的和平对话。因此中国要求在重大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获得更多的投票权或发言权,以增加国际组织的民主力度与合法性。

此外,中国也支持国际社会的多极化趋势。显然,多极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平等观

念的结果。多极化是单极体系或霸权秩序的替代品,虽然“极”的观念反映了现实世界秩序始终由一个、两个或多个大国(集团)所控制,但多极体系比单极或霸权秩序更接近于多元思想的平等含义,至少,多极化意味着几个大国之间的平等状态。

多极化主张最能体现中国对国际平等的重视。在实践中,它体现为对霸权主义的强烈反感和坚决抵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并警告政府和共产党干部在处理与外国的关系时“永远不干涉他国内政,而应与他们平等相待”。^{(2)(P175)} 后来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反霸政策,宣称“我们的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对之前的反霸政策略有修改。这是由于第三世界并非一个完全团结一致的世界,有些发展中国家与美国或苏联有良好的或者是同盟的关系,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具有称霸地区的野心,因此反霸外交不再针对具体国家,而针对所有霸权主义行径。无论如何,原则上的反对霸权主义政策一直得以延续。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会议上宣称,“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实行扩张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着重通过双边外交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大国的关系。譬如,我国与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建立有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讲,双边主义有可能会对双边关系外的国际行为体利益与偏好的忽略,但我国的双边关系并不旨在处理双边之外的事务,因此不存在干涉双边关系之外行为体内部事务的嫌疑,中国政府强烈反感所谓“中美两国集团”(G2)就是一个例证。我国目前所坚持的双边主义依然符合尊重他国主权和追求国家间平等地位的基本原则,因此,中国的双边主义就是追求与世界上主要大国平等地位的重要途径。

(2) 宽容外交。宽容意味着对他者的容忍、以对话取代暴力、多边主义取代单边主义、以及非干涉原则。与单边主义相比,多边主义方式更具建设性,也更符合宽容精神。³ 不过从1950至1970年代,多边主义并非中国外交的基础理念。1950年代初期冷战在东亚蔓延,中国采取了联合

¹ 参见 Kung Chuan Hsiao, *Introduction: 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INC, 1927.

² 例如,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言,指出中国外交的目标之一是促进国际民主。

³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7年。

⁴ 根据约翰·罗杰(John Gerard Ruggie)的观点,多边主义表示在国际事务中,基于普遍的行为规则,用以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见 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1992, pp 561-598.

苏联共同反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即使到 1970 年代,在大部分重要的国际组织中也很难听到中国的声音。一般而言,从 1950 到 1970 年代,特别是在 1960 年代,中国实施了某种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但从 1980 年代开始,中国采取开放政策,多边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从 1990 年代开始,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规模与速度得到急速提升,¹它甚至开始主动创立新的国际多边机构(如上海合作组织),并日益得益于这些机构。此外,长期以来,中国高度坚持不干涉原则。1950 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基本原则”,这一包含了不干涉内政的多项原则得到了当时印度和缅甸的赞同,其精神后来也在万隆亚非会议上获得广泛的支持。虽然有一段时间中国偏离了这一原则,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不干涉原则始终为中国政府所坚持。

基于宽容原则,中国也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而非武力或威胁的方式解决国际热点和难点问题;此外,中国也主张世界各国坚持符合各自历史与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

二、作为中国外交理念基础的多元思想的根源

无可置疑,作为当前中国重要外交理念的多元思想具有多种来源,而这些来源不仅有现实的和客观的因素,也有历史的和主观的因素。一般而言,它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所处的民族国家体系和 1980 年代以来的特殊发展历程。

1 历史层次: 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不言而喻,一个国家的外交特质会受其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传统不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外交实践模式,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外交决策者的观念。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外交理念当然不可避免地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宽容作为一个突出的因素或特征,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

早在殷商时期,统治者就将天下人群分为两类——中国人和野蛮人,而其中野蛮人又根据方位分为四族,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分居于中国四周。后来,周武灭商之后建立起周朝,这一朝代对中华文化(尤其是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²从早期中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开放性”,这一特性在以后的世代中也得以巩固。例

如,作为一个地处边陲的王国,秦国被其它中原王国视作西戎之国。然而,这一王国最终统一天下,建立起强大的帝国,从而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官僚政治和社会制度。

一般而言,中华文化开放和融和的特征得益于不同民族之间不断地融合甚至互通婚姻。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有好几次成为全国的统治者,不过他们最终都接受了中华文化,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随着不同民族的不断融合,开放性和宽容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显然,开放和宽容观念不允许那些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生长与繁荣,因此很难在中国找到不同宗教的相互迫害,以及统治者对宗教团体实施残酷迫害的历史记录。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它们之间几乎从未发生过重大的冲突。事实上,一些佛教徒同时也是道教徒。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其中佛陀曾协助玉皇大帝打败了一个妖猴——孙悟空,这表明佛陀和道教诸神是朋友而非敌对关系。然而宽容是如何塑造古代中国的外交事务的呢?这只要看看运作了将近 1500 年的东亚中华朝贡体系就可以了。在中华朝贡体系内,虽然中国是主导力量,然而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周边国家,若能定期向中国朝贡以表明对中国皇帝的尊重,它们就能保持其内部独立并免于中国干涉。一般情况下,只有那些遭到外部侵略和发生了严重内乱而寻求中国帮助的属国才会得到中国官员或军队的直接干预,以便恢复其国内及区域稳定。³在中华朝贡体系内,中国很少干涉其邻国的内部事务,而主要通过中华文化的魅力来施加影响。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已几乎破坏殆尽。不过自 1979 年中华传统文化在 21 世纪的复兴似乎正成为一个趋势,它开始产生于民间,并逐步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在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中国外交风格无疑也将更多地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2 行为体层次: 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不完善

作为一个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主权平等与独立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而多元思想有助于中国坚持主权平等与独立原则。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全面的现代化进程始于 1912 年中华民国建国之初,但现代观念在此之前就已经产生,它最早开始形成于 19 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和清朝末年犹豫不决的宪政主义

¹ 参见 Samuel S. K.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i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Also see Christopher R. Hughes, *Nat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2005, P8.

² 例如,儒家作为古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传统,就深刻地受到了周朝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改良。¹ 然而,最有影响力的现代观念的普及得益于“五四”运动,它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口号。然而现代启蒙运动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断,之后又是3年国共内战,最后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并非基于自由主义(如选举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而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现代启蒙运动开始了。直到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也从未放弃过现代化的口号。

直至今日,中国依然需要处理两大任务——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民族建设。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并不将自身视作一个民族,在传统文化中,外国人或异族人成为中国人并非难事,这无关其血缘与宗教信仰,只要他(她)愿意接受中华文化并认同它。“至19世纪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帝国,民族主义并不存在。只有在1840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中中国惨败之后,中国政治精英开始接受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以加强其国防和谋求重生,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了中华帝国的最终解体,也是在列强面前国家主权的流失。”² 因此古代中国只存在诸多族群,当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所有这些族群被归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即“中华民族”。然而在以后大约100年间(1912至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依然值得研究。”³ 与此同时,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依然崇山阻隔。这意味着民主转型还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民主建设出现了两个独特的进程,即“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但依然没有涉及政治民主化的核心。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始于1980年代,1990年代后由于邓小平南巡而加速了;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经济体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然而,一个在地域上完全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在中国依然没有实现,还存在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而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也并没有作清晰而科学的划分,这使得官员腐败现象日益严峻。同时,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益因法制不健全而遭到损害,当有些公民受到不公正对待时,社会正义并不总能及时得到保障和恢复。尤其近年来,由于社会分层的加剧和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公民权益正面临削弱的危险。而且由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分裂状态没有结束,中国领土尚未统一。

因此,在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完全的政治民主化、地区平衡发展的市场经济、公民权切实得

到保障和领土完全统一等所有目标实现之前,中国还难以被称作一个现代国家。而一个处于追求这些目标、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中国,是不会放弃主权独立和平等原则的,而多元思想观念,完全符合对各国主权独立和平等原则的尊重。

3 体系层次: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冷战的伤疤

20世纪前后中华朝贡体系在东亚彻底崩溃以后,东亚国际关系便在一片混乱之中无法自拔,分别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冷战结束之后依然存在潜在的区域冲突。不过总体而言,目前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这一体系下,除日本和韩国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之外,这一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通过自助方式来确保主权独立和其他国家权益。这可以从这一地区的安全状况加以解释。例如,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如印尼、菲律宾、越南和日本等存在领土纠纷。尽管马英九上台之后,台海关系得到了缓解,但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一良好关系趋势可以永久延续。因此中国国家安全并不比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中国国防力量的增强部分基于这些潜在冲突的存在。此外,东亚地区的冷战态势也并没有随着全球冷战的终结而结束。作为冷战的产物,美国领导的美日和美韩军事和政治同盟是以防止日本和韩国遭到中国、苏联和北朝鲜等假想敌的攻击而建立起来的。如今冷战在全球层次已经终结,但这些同盟并没有随之瓦解,甚至有加强趋势。同时,具有冷战根源的北朝鲜核问题也日益棘手。

基于上述国际现实,中国只有通过加强主权独立来保障自身安全,即使在经济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时代,这一任务并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因此强调在多元主义基础上尊重各国主权,是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基本原则。

4 认知层次: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特殊国家

视中国为特殊国家的观念植根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复杂的现实。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在其早期就认为中国是一个特殊国家,其民主革命的道路不应照搬苏俄,因此最终采取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完全不同于列宁在苏俄所采取的革命方式。当社会主义中国建成之后,中国政府又巧妙地进行社会动员,在1960-1970年代反抗苏联的沙文主义,和

¹ 第一次致力于中国经济和军事现代化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西化运动发生于19世纪中后期,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² Su sheng Zhao, China's Pragmatic Nationalism: Is It Manageabl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5-06, p132

³ 自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大量中国知识分子就撰文塑造中国的民族认同。见 Tze-Ki Hon, *Ethnic and Cultural Pluralism: Gu Jiegang's Vision of a New China in His Studies of Ancient History Modern China* 1996 22: 315 p33

在 1980-1990 年代反抗西方的自由主义。1979 年以后, 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是一个非常有别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的类型。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此外, 根据西方历史经验, 任何国家的崛起总会伴随着区域甚至全球性冲突, 但中国领导人认为, 中国的崛起或发展将是一个和平的进程。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 “华盛顿共识”遭到了广泛的垢骂, 而英国记者乔舒亚·拉姆 (Joshua Cooper Ramo) 所提出的“北京共识”, 虽然激起学术界激烈的辩论, 但中国政府似乎对此概念比较冷淡, 或者并不接受。中国政府始终认为中国模式 (或“北京共识”) 不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和移植, 作为一个特殊国家,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无法复制的。

总之, 中华文明 5 千年连续绵延的特殊历史、1920 年代至 1950 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道路及其成功、以及近年来中国因采取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而获得的快速崛起, 使得中国领导人视中国为一个特殊国家。而多元思想包含着特殊论的因素, 一个特殊的国家的发展方式在多元主义框架下是可以获得承认的。

结 语

2005 年 4 月, 胡锦涛在一次亚非峰会上指出, 中国外交的目的是与其他国家一道建设和谐世界。在中文世界里, “和谐”是一个与“礼”有关的儒家概念, “礼”指的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秩序和结构, 在这一秩序和结构中, 每个人满意或安心于其社会地位以及根据其身份而在社会中所应承担的义务。根据儒家的“和谐”理念, “和谐世

界”应该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每个国家都对自身的国际地位或身份以及根据其地位和身份所应承担的责任感到满意和顺从。对“和谐世界”的理解不能只仅限于“礼”的社会结构与秩序。而“和谐世界”应通过和平、合作和自愿的方式建成, 它强调国家主权平等。因此, “和谐世界”不仅是为实现稳定的世界秩序而规定的中国外交战略目标, 也是用来致力于一个更美好未来世界的全新方式, 而这一方式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 诸如国家平等、合作、讨论、说服、协商一致和承认现实的多元性, 而所有这些方式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符合多元主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 建设“和谐世界”是一个实践和巩固以多元思想为哲学基础的外交战略。然而, 这一将构建“和谐世界”作为目标和方法的中国外交将受到两方面的挑战, 一是客观现实中的国家不平等和地区发展不平衡, 二是其他强大的和雄心勃勃的国际行为主体主观上的竞争。就后者而言, 美国和欧盟都正分别以霸权方式和所谓“规范化” (normalization) 方式扩大它们的影响力, 扩张的目标和方式都不太符合建设“和谐世界”的宗旨和方法, 因此这将成为以多元思想为哲学基础的中国外交的持久挑战。

〔参考文献〕

- [1] [英] 巴里 (J. B. Bury). 自由主义思想史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 [2] 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 11 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 [3] 简军波. 中华朝贡体系: 意识形态结构及其功能 [J]. 国际政治研究, 2009, (1).

Practice and Source the Pluralistic Ideas in China's Diplomacy

JIAN Jun-bo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22, China)

Abstract Pluralism as an important Chinese diplomatic principle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respect for sovereign equality and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mplementation of prudent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objection to hegemonism, and so on. As the general philosophical basis of China's diplomacy, pluralism is mainly rooted in four areas includ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ursuit of a modern national identity, the existence of sovereign-state system in East Asia and the Cold War legacy systems, and the national leaders' perception on China as an exceptional state. Yet considering the reality,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 based on pluralism will meet challenges from the Western counterparts along with the US hegemon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European Union.

Key words pluralism; China's diplomacy practice; source

〔责任编辑: 左安嵩〕